

评左贞观《冼星海在苏联》

关冰阳

[摘要] 由于原始资料缺失等原因，既有的冼星海生平与创作研究中关于其法国时期与苏联时期的成果相对较少。左贞观《冼星海在苏联》一书用档案文件、调查采访、文献等不同类型的材料，按时间顺序系统叙述并基本还原了冼星海1940年底到达莫斯科至1945年在莫斯科逝世的经历。其重要贡献在于：第一，披露了珍贵的原始档案文件，这些档案文件充分证明了冼星海不仅是勇于探索的艺术家，更是具有强烈组织纪律性的共产党人；第二，采用多样材料进行互证，证明冼星海在辗转多国（地）的生活中始终坚持学习和创作。该书以左贞观自1988年以来搜集记述的丰富的资料为基础，进一步印证了冼星海在逆境中顽强乐观的人生品格与至死不懈的创作热忱，同时，澄清了前人研究中因资料不足而产生的部分误解，为冼星海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但对一些特定历史事件的成因，该书尚存解释力不足之处。分析其中部分矛盾，可以更进一步还原历史面貌，完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的人生拼图。

[关键词] 冼星海；苏联时期；个人档案；左贞观；《冼星海在苏联》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26)01-0092-08

DOI:10.20093/j.cnki.CN21-1080/J.2026.01.10

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有关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创作与生平研究形成了十分丰硕的成果，系统性整理与出版了大量乐谱、文字、图片等原始资料。但冼星海一生行迹广阔、经历丰富，其法国巴黎留学时期与生平最后一段在苏联时期，由于历史背景、资料留存等种种客观原因，现存的文献资料始终不够完整，相关生平轨迹也缺少更为确切的时间记录与细节佐证。此前，这一部分研究的相关成果与实践积累较为薄弱。近年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深化、史料挖掘条件的改善，对冼星海在苏联时期的研究已经有若干成果，如张中华编译的著作《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查太元编著的《冼星海年谱》和撰写的文章《冼星海

生平研究之相关史料考证举隅》，秦启明撰写的文章《冼星海在苏联》《不顾一切 为党努力——冼星海的苏联之行》，左贞观的著作《星海在苏联》及撰写的文章《星海在苏联之新探》《〈黄河大合唱〉在苏联》《冼星海两次赴莫斯科的档案资料新发现》，李岩撰写的文章《论冼星海实验性新技艺之“本真”》等。但学术界至今还未有以一手原始史料为核心基础，兼具专题性且通贯其苏联时期全貌的系统性著作。作曲家、音乐学家左贞观于2025年5月出版的专著《冼星海在苏联》（由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社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冼星海研究中此类著述的空白，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史料视角与研究基础。

作者简介：关冰阳，博士，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沈阳音乐学院重点科研项目“东北音专（1953—1957）时期民族民间音乐理论、教育与创作表演实践研究”（2023KYZ02）。

一、《冼星海在苏联》的特点与内容构成

1988年，左贞观赴苏联，在其加盟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今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及克斯塔奈等地寻访冼星海事迹。截至目前，左贞观先后发表过4篇关于此方面的论文，《冼星海在苏联》即是在这4篇论文基础上经扩充与完善而成的著作。与此前的单篇论文相比，成书的变化之一是内容更完整、条理更清晰。原先集中在同一篇目中、未必贴合的几部分内容，可在书中更合理地分配到相应章节。如在《冼星海在苏联之新探》一文中，关于冼星海和普罗科菲耶夫的关系、在哈萨克斯坦的经历等内容分属不同时期，在篇幅更大、时间线索也更长的专著中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处理。另一变化，也是体现本书写法特点的则是在主体叙述之外，有更为充裕的篇幅引用作者历年整理与积累的前人或时人论述，以及更为关键的档案资料以印证或丰富叙述。就阅读体验而言，大量的引用似乎容易让人觉得流畅性不足。但这些引用内容无论作为关键的例证，还是相互参照比对，都无疑是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

全书共9章，243页。在切入“冼星海在苏联”的主题之前，左贞观先以两章的篇幅概述了冼星海早年学习创作历程及他在延安时的相关情况。这两章着重介绍冼星海在法国学习时接受苏联文化与作品的影响，以及与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交往经历。显然，这两章的加入是全书的核心部分，为冼星海赴苏联并滞留提供了更为合理的主观动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他对苏联音乐的长期关注，而这一重要史料，恰可与书中论述形成重要补充与互证，但该书中并未提及的是冼星海在日记中说到的，其在延安时也曾听过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录音：“1939年（笔者加）4月15日晚上，我借了10张肖斯塔科维奇《e小调第一交响曲》（Op. 10）的唱片来听。我觉得他有点受德彪西的音乐影响，但他的音乐是带着俄国民族

风味的，配器十分严整。”^[1]

最后两章以1949年以来冼星海于苏联及哈萨克斯坦的经历为核心，分别就《黄河大合唱》在苏联的演出与版本变迁、苏联音乐学家施奈尔松著作中对冼星海的叙述与评价、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以来对冼星海相关事迹的挖掘与纪念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为研究冼星海的艺术贡献提供了重要参照。这两章的内容主要是冼星海身后之事，除了拓展时间维度外，与主题的相关性不强，但其中部分内容如《黄河大合唱》受到的重视、施奈尔松的论述等，与后面的主题文献相对比，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全书的核心内容集中于第三至第七章。除了第六章以插入形式专题介绍了冼星海在苏联的婚姻外，此部分的整体结构是以冼星海1940年底到达莫斯科后的时间为序，分章论述了冼星海“首赴莫斯科”“在蒙古”“在哈萨克斯坦”“再赴莫斯科”四个阶段的生活与创作历程，对其异国生涯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完整呈现。就冼星海人生与创作的宏观脉络而言，此部分以冼星海本人的创作杂记自述与前人的研究基础，对冼星海在迁往蒙古国乌兰巴托后，是否如其他人所说，曾经由莫斯科折返至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2] 74}，以及冼星海本人是否曾经去过塔什干等问题^{[2] 121-122}进行了澄清。除此之外，此部分并未有本质性的新观点。但最能体现前述引用与叙述并重写法特点，也是本书最有价值的，是该书使用了关键性的档案资料，并结合他人论述提出了作者的判断。

二、《冼星海在苏联》的价值所在

（一）原始档案的披露

1. 档案概况

左贞观曾在《冼星海两次赴莫斯科的档案资料新发现》一文中概要性介绍了与冼星海有关的新档案，如“冼星海的档案里就有57页个人资料；袁牧之档案里有7页个人资料”^[3]。但此前，原始档案材料仅公开了冼星海1943年于阿拉木图

写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冼星海在苏联》一书则在不同的章节叙述中，以原文转录并附带档案原件图片的形式展示了另外8种档案的核心材料，其中5种为俄文材料，书中展

示材料的方式为中文翻译加档案原件，不含俄文原文转录。同时书中还以概要叙述的形式，对2种档案材料进行了间接公布与核心内容梳理，极大丰富了史料依据（见表1）。

表1 《冼星海在苏联》直接展示的档案

发出方	接收方	时间	时期	原件语种	性质	原件名称	内容概要	书中页码
周恩来	共产国际	1940年3月5日	首赴莫斯科	中文	介绍信	关于袁牧之、冼星海两人的印象	介绍袁牧之、冼星海的个人情况	44—46
莱娅	不详	1945年6月21日	再赴莫斯科	俄文	个人简历	无	个人简历及与冼星海关系	154—157
冼星海	季米特洛夫	1945年5月19日	再赴莫斯科	俄文	求助信	无	自1941年从莫斯科疏散后的工作简况，1945年回到莫斯科后求助安排就医	178—184
沙尔曼	季米特洛夫	1945年5月21日	再赴莫斯科	俄文	工作汇报	无	向季米特洛夫报告冼星海病情并寻求工作指示	184—185
季米特洛夫	布萨洛夫	1945年5月22日	再赴莫斯科	俄文	工作指示	无	指示将冼星海送往克里姆林宫医院	185—187
冼星海	不详	1945年7月22日	再赴莫斯科	中文	求助信	无	求助演出交响曲及《黄河大合唱》，为莱娅安排住处	191—195
冼星海	尼古拉耶夫	1945年9月2日	再赴莫斯科	中文	求助信	无	求助演出作品及加入苏联作曲家协会	195—198
施奈尔松起草，落款署名为格里埃尔、哈哈图良、别累伊、穆拉杰里、别利亚耶夫、罗佐娃、施奈尔松等7人	无	不详	再赴莫斯科	俄文	悼词	中国作曲家冼星海去世了	概述冼星海创作事迹并追悼其逝世	205—207

由表1可知，当前在论文中可见的档案涵盖了冼星海在苏联旅居期间的3个关键时期，但史

料的留存与分布极不平均。除了周恩来的介绍信（实际上是从延安带来的）和冼星海在阿拉木图写

给季米特洛夫的信外，其他史料都只与冼星海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有关。另外，《冼星海在苏联》一书还以叙述方式间接提及了两件档案的核心内容，却未直接展示档案原文。为便于研究，现将

其要点归纳整理，系统呈现冼星海和袁牧之在苏期间的艺术诉求与行程交涉，补充此前未公开的一手文献线索，完善冼星海留苏史料体系，其大体内容整理如下（见表2）。

表2 《冼星海在苏联》间接展示的档案

发出方	接收方	档案形式	时期	内容概要	书中页码
冼星海	不详	纸条	首赴莫斯科	要求对方归还乐谱	68
袁牧之	苏联电影界领导人	信件	不详	请求留在苏联，计划拍摄关于中国的史诗性影片	148

2. 档案内容与价值

首先，这些档案印证了冼星海的党性修养。冼星海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的党性修养在周恩来的介绍信中已经有“他政治认识好，工作积极”^{[2] 45}的表述。他的党性修养体现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这是他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得到了更好的印证。如书中所述，冼星海与袁牧之赴苏联进行《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工作及进一步的学习考察工作，均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与安排下进行的。对于此事，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记录如下：“1940年11月22日，与从中国抵此的电影导演和作曲家谈制作关于中国的纪录片问题。”^{[4] 115}但翻遍《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的中文版全书，关于冼星海、袁牧之的相关情况，仅有这一处。因此，冼星海从莫斯科被疏散到后方，回国计划受阻后留苏工作，这些安排均是由共产国际直接指示的。而对这些安排，按档案中冼星海写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所说：“组织已决定我和十多位同志的行动。我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共产国际给了我们的任务回国。我毫无犹疑地执行了这个任务。可是到了阿拉木图后才知道行动有些变动。根据共产国际的电报，是要我们暂时在阿拉木图工作，我也毫不犹豫地服从这个决定。可是，当时我们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其他四位同志坚决否认莫斯科的来电……而我则不同意他们的武断和否认莫斯科的决定……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要相信共产国际，服从组织……我如果以音乐为生

活，我应该怎样去工作？为保守秘密而不公开，音乐工作和我所写的那些作品是否完全不能表演？这些问题希望给我答复。”^{[2] 86-88}从以上表述均可以看出，冼星海不仅是一位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更是一名组织纪律性很强、以服从党组织命令为要务的共产党人。虽然如书中所说，他提出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但他后续无论是在阿拉木图，还是迁往克斯塔奈，都一如既往地勤于创作、积极工作。

其次，这些档案间接说明了冼星海生活困顿的原因。如冼妮娜在《冼星海：最后五年的艰难岁月》一文中所说，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时“没有户籍，没有工作，没有熟人……已完全与组织失去联系，而沦为不折不扣的流浪汉”^[5]。在哈萨克斯坦时期，生活的困顿应该是使冼星海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最终过早逝世的直接原因。但通过书中第五章左贞观通过寻访当年的知情人还原的情况可知，冼星海当时曾与阿拉木图当地作曲家协会及众多音乐家建立联系^{[2] 99-106}。可见，他当时并不是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被动境地，但其始终没有正式工作和生活困顿的原因仍值得深究。另外，冼星海生活困顿的原因还可以从1945年9月2日冼星海致尼古拉耶夫信中推断一二。虽然书中提及收信人尼古拉耶夫的身份不明，但从信件内容专门针对音乐专业看，尼古拉耶夫应该是相关音乐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信中，冼星海希望对方解决或说明的两个问题之一，便是“关于我

本人加入苏联作曲家协会问题”。而理由是“我要提前考虑病愈之后的生活。没有协会会员资格，生活便没有保障。这点过去的经验已经给我深刻的教训了”^{[2] 198}。“过去经验”是什么？何以能与作曲家协会会员的身份联系在一起？不难理解，这与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经历相关。这也可以告诉我们，冼星海此前的困顿，正是因为高度计划体制下缺乏明确的身份定性，因而无法获得与身份相应的生活保障。

（二）文献间互证

前文已提到，左贞观的专著《冼星海在苏联》一书将写作中不同类型的文献引用与作者论述相结合，对相近内容的不同叙述进行了对比，发现了一些不易察觉的问题。如查太元曾在《一块重要的拼图——谈左贞观〈冼星海在苏联〉》中提问：“苏联音乐界对这位中国同行，到底抱有什么态度或评价？他们的正面评价是发自真心或是客套？”^[6]对此，书中穆拉杰里、施奈尔松的论述及档案中施奈尔松起草的冼星海讣告等几种文献均可提供部分证明。

穆拉杰里撰写的《冼星海——中国天才的作曲家》一文刊载于《苏联音乐》1949年第6期，其中有这样的内容“过了几天正有一场冼星海与几位苏联作曲家的小型座谈会……冼星海还弹奏了自己的交响大合唱《黄河》。记得该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描写了滋养了中华儿女的母亲河的形象”^{[2] 56}。

施奈尔松在1956年出版的《冼星海》一书中也写道：“我与当时名叫黄训的冼星海在莫斯科有过多次的见面……我听他给我弹奏他的交响乐、合唱作品。”^{[2] 224}同时，该书还“详细介绍了《黄河大合唱》《第一交响曲》《中国狂想曲》等内容。这三部作品的每个乐章都有解说”^{[2] 223}。

如果仅从以上两处记载看，我们会认为，穆拉杰里与施奈尔松都曾与冼星海有过比较直接的接触，并对《黄河大合唱》进行了正面评价，但是在本书披露的档案材料之一——由施奈尔松起草，并联署格里埃尔、穆拉杰里、施奈尔松等人

姓名的冼星海悼词中，对冼星海的作品则是这样表述的：“冼星海创作了大量为广大战士与人民所熟知和喜爱的战斗性进行曲及歌曲。与此同时，他还写下一系列杰出的大型交响乐、小提琴与钢琴、声乐与乐队等作品。其反法西斯交响乐以中国民歌为基础，堪称成功而天才的杰作。它体现了冼星海对祖国的热爱。”^{[2] 205-206}

比较上述三种文献记载可以发现，冼星海三部作品的差别耐人寻味——其中获得高度评价的是《第一交响曲》与《阿曼盖尔达》，而并没有提到《黄河大合唱》。

或许，我们可以将这种差别解释为文献记载内容的差异性。悼词不同于学术文章，其起草不一定需要精心构思，多为仓促而就，随意之处较多，内容不一定精确。那么，我们再看关于罗曼·卡尔曼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中的相关内容。作为曾访问延安，“见到了冼星海，并听到他亲自演唱了刚创作出来的《黄河大合唱》的情景”^{[2] 50}的导演罗曼·卡尔曼，于1941年，在苏联中央新闻纪录片制片厂制作完成了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其中的字幕上还有“导演：卡尔曼，作曲：冼星海”^{[2] 51}的字样。当然，这也带来另一个当下无法解释的新问题。众所周知，出于工作安排需要，冼星海在苏联时化名为“黄训”。从该书披露的若干档案资料看，冼星海除了在与季米特洛夫通信时使用原名外，几乎没有使用原名的情况。左贞观等在哈萨克斯坦寻访当年知情人的过程，以及冼星海在苏联安葬时的墓碑署名亦可作为佐证。那么，为何罗曼·卡尔曼会在自己制作的纪录片字幕中标注冼海星的真名？他们虽在延安有交集，但如果在苏联期间再次见面，组织纪律性极强的冼星海是不可能不提醒罗曼·卡尔曼注意署名问题的，这一点有待深入研究。

经过聆听比对，不光如左贞观所说“片子一开头就有《义勇军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水谣》”^{[2] 51}，更如纪录片的音乐主题一般贯穿始终。当表现军民奋战的场景时，会出现

《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当描绘中国的自然人文风光时，就会出现《黄水谣》主题旋律，而这些配乐都是由交响乐队演奏的。虽然受原始资料限制，目前尚无法确定纪录片配乐由哪个乐团录制，但最迟至1941年，《黄河大合唱》的部分音乐已经被苏联电影界人士所知。

三、《冼星海在苏联》未解决的问题

早在1980年，在钟敬之追忆袁牧之的文章《一部未完成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追念袁牧之同志》中，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标题便已被定义为“未完成”。文中写道：“1959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高维进同志去苏联搜集材料时，曾经正式向苏联方面询问过关于《延安与八路军》这部影片的下落，据苏联有关方面答复，在苏德战争期间已将这部影片的全部底片和素材，托交当时在‘第三国际’工作的一位同志带回中国，至于下文如何就一直未予查究了。”^{[7] 54-55}钟敬之又提及：“袁牧之……着手主持人民电影事业第一个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创建工作。我在那一段与他相处的时间里，也曾向他问过关于《延安与八路军》的事，但一直没有听到他详细谈下去。”^{[7] 43}此类叙述虽然出自当事人之口，并成为此后电影界通行的定论，但在同一篇文中并存这样两段叙述，不免令人存疑：这部受中央嘱托、历尽艰险送往苏联进行后期编辑制作与配乐的《延安与八路军》，为何在导演袁牧之那里始终语焉不详。

这一点在《冼星海在苏联》一书中也多次被提及。如“冼星海对自己的创作是很细心的。在来到苏联后，他的全部创作都会记载在《创作杂记》里……但他一次也没有，一个字都没提到过在给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写配音的工作”^{[2] 49}，“1945年，袁牧之回到莫斯科后，一直待到1946年年初，他有没有关心一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下落？”^{[2] 148}。从冼星海较高的党性修养与组织纪律性看，这一点也完全值得怀疑：

作为一名责任心如此之强的共产党员，接受党中央嘱托去苏联完成的任务，会如此不了了之吗？

对此问题，左贞观给出了推测：“从作曲家的角度看，他正在创作的第一《民族解放交响乐》的音乐，作品对《延安与八路军》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纪录片需要的也只是背景音乐。要是他手里有现成的、创作了多年并在莫斯科刚刚完成了总谱的交响乐，他可以毫无顾虑地把交响乐用在纪录片里。”^{[2] 49}笔者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受其后文所述，罗曼·卡尔曼的《中国在战斗》配乐中使用冼星海《第一交响曲》素材一事的启发，但该推测目前尚无档案资料予以佐证。1945年，冼星海回到莫斯科，他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说：“1940年，我与其他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赴莫斯科执行特殊任务。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协助下，我们顺利完成了任务。”^{[2] 178}虽然信中并没有明言“特别任务”的具体所指，但以季米特洛夫为代表的前共产国际，本就是冼星海一行赴苏的接洽方与组织上级，这一隐语应是双方共同明确的。而在随后的7月22日冼星海给没有留下姓名的收信人、9月2日给尼古拉耶夫的信中都提道：“很感谢你把我写的‘民族交响乐’保存了这样久和慎重地把它保护送还给我。这次我到莫斯科的目的，想演出这首‘民族交响乐’……”^{[2] 191}“关于莫斯科音乐会要演奏我的《第一交响乐》问题，请你现在决定‘能’或‘不能’，使他们可以准备。”^{[2] 197-198}如此迫切并频繁地希望《第一交响曲》演出，可见冼星海对它的重视，很难想象如此珍重的作品会被“毫无顾忌地用在纪录片里”。结合文献细读可见，那种过于轻松对待作品与任务的心态，与档案所呈现的冼星海形象相去甚远。

从纪录片再切回此前未解决的问题，冼星海为何会被困于哈萨克斯坦，失去身份、衣食无着。这一问题的部分答案可以在冼星海当时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找到，冼星海在信中说：“除了高同志（袁牧之的化名）有任务留在阿拉木图工作之外……”^{[2] 87}后文又对这项工作进行了解释：“被安排到因战争缘故从莫斯科迁到阿拉木图的莫斯科电影制片厂

去工作。”^{[2] 147}在与冼星海一同赴苏的人员中，已有一人参与了相关工作，而冼星海却未被分配工作。该书将冼星海对工作安排的诉求未获回应的原因为“共产国际于5月30日解散了”^{[2] 9}以上两种分析都难以令人信服。组织或许不存在，但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给予建议或帮助也并不过分。因为从冼星海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季米特洛夫本人是十分关注各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冼星海在1943年1月4日的日记中还记载了一件事，他当时给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中央书记尤苏波夫写了一封信，其主题就是呼吁为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陷入困难的西班牙政治侨民提供必要的帮助^{[4] 224}。如果冼星海的类似情况被季米特洛夫所知，季米特洛夫是不可能不施以援手的。毕竟据档案资料记载，1945年，冼星海之所以能在莫斯科得到医治，是因为医院收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从《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的记载看，季米特洛夫在1942—1945年始终与延安保持通信联系，持续关注中国情况，如在其1942年7月11日^{[4] 202}，1943年11月23日^{[4] 265}、12月22日^{[4] 261-268}、12月28日^{[4] 270}，1944年1月7日^{[4] 272-274}、3月7日、7月25日的日记中，均有关于中国的相关记录^{[4] 303}。由此可见，季米特洛夫并没有因共产国际的解散而中断与中国的联系。冼星海写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件能保存在冼星海的档案中，也证明了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邮路与通信渠道并没有完全断绝，仍具有一定程度的通信联系的可能。

那么，为什么在1943年2月以后，季米特洛夫没有进一步给冼星海工作安排？我们可以在其他档案中继续寻找答案。就在这一年，冼星海分别把作品寄给被疏散到阿拉木图的著名作曲家波波夫和随列宁格勒音乐学院迁移到塔什干的作曲系主任施泰因堡，他们友善地评价了冼星海的作品，这件事也被冼星海记录在他的《创作杂记》当中^{[2] 9-11}。但是机构也好，个人也罢，都没有能够再进一步为冼星海提供急需的实际支持。究竟为何如此？

四、结语

斯人已逝久矣，但冼星海在苏联的人生拼图尚且有明显的缺失。虽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辗转多地，但冼星海始终以饱满的热情进行音乐体裁与形式的创新。他的部分作品的版本特征甚至与我们熟知的作品风格大相径庭。这让人不禁幻想，如果他能如当年同期赴苏的同志们一样回到祖国，我们将会见识到一位作品更为丰硕、风格更为不同的冼星海。但是这种可能性在1945年的深秋戛然而止。他以赤诚之心坚守艺术理想，用音符传递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他的英年早逝，于其家人、于中国音乐事业而言，都是重大损失。其未竟之志与艺术理想，至今仍激励着后世的音乐学人。在冼星海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帮助过他的李莎回忆道：“去世前他曾对我们说，中国在民主胜利以后一定要在首都建立音乐学院，这将会是壮丽的建筑，有大理石的阶梯，墙上有很大的玻璃镜子，将是一个音乐的宫殿。许多年后，当我每次来到北京的音乐厅走上大理石的阶梯时，都会看到墙上那面很大的玻璃镜子上挂着的冼星海肖像。”^{[2] 189}赤子丹心昭日月，乐章千古励后人，乐魂永铸，精神长存，愿我们早日拼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人生拼图。

参考文献：

- [1]《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冼星海全集: 第一卷[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269.
- [2]左贞观. 冼星海在苏联[M]. 莫斯科: 尚斯国际出版社, 2025.
- [3]左贞观. 冼星海两次赴莫斯科的档案资料新发现[J]. 人民音乐, 2022(1): 35-40.
- [4]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M]. 马细谱,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5]冼妮娜. 黄河大合唱[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5: 112.
- [6]查太元. 一块重要的拼图: 谈左贞观《冼星海在苏联》[EB/OL]. (2025-06-27)[2025-08-31]. <https://>

mp.weixin.qq.com/s/JdpOz4_dLhKX iivGOPKHFg.
 [7]钟敬之. 一部未完成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追念袁牧之[J]. 中国电影,1980.

(本文为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评论学会第二届
 中国音乐评论推优活动“书评类”优秀作品)

A Review of *Xian Xinghai in the Soviet Union* by Zuo Zhenguan

GUAN Bingyang

Abstract: Due to the lack of primary sources and other reasons, existing studies on Xian Xinghai's life and creations have remained relatively inadequate regarding his "Paris Period" and "Soviet Period". Zuo Zhenguan's book *Xian Xinghai in the Soviet Union* systematically narrates and basically restores Xian Xinghai's experiences and key chronological nodes from his arrival in Moscow at the end of 1940 to his passing there in 1945, in chronological order, based on diverse materials of different types and sources including archival documents, field interviews and Sino-Soviet literary sources, and puts forward conjectures about the causes of certain events. Its major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discloses precious original archival documents, which fully demonstrate that Xian Xinghai was not only an artist courageously committed to exploration, but also a Communist Party member with a strong sense of organizational discipline. Second, it realizes cross-verification of diverse materials. Xian Xinghai's consistent perseverance in learning and creation throughout his life in and travels across multiple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s long been evidenced by his own creative statements and works, but such a perspective is inevitably one-sided. Drawing on accounts from others collected since 1988, this book enriches and further proves Xian Xinghai's tenacious and optimistic character in adversity as well as his unwavering creative passion until his last breath, and clarifies some misunderstandings in previous studies caused by insufficient data. Nevertheless, the book still suffers from insufficient explanatory power or lack of further elaboration on the causes of certain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contradictory points to further restore the historical truth and complete the life puzzle of Comrade Xian Xinghai, the people's musician.

Keywords: Xian Xinghai; The Soviet Union period; Archival documents; Zuo Zhenguan; *Xian Xinghai in the Soviet Union*